

书评

《郑万钧专集》(Collected Works on Zheng Wanjun)

《郑万钧专集》- 郑万钧林业学术思想研究, 《郑万钧专集》编委会编著 (ISBN: 978-7-03-023072-0), 2008 年 10 月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该专集 16 开本, 684 页, 112 万字, 印数: 2100, 书价 (精装): 178 元。

该书目录 (中英文) 包括: 题词, 照片, 序 (中国科学院院士吴征镒, 中英文), 出版前言 (《郑万钧专集》编委会); 上篇 (1~138 页) 郑万钧林业学术思想研究 (包括治学精神、科研风范、学术思想对后人的启示及主要论著评析), 中篇 (145~608 页) 郑万钧论文精选 (其中中文部分 31 篇及附文 1 篇, 外文部分 14 篇); 下篇 (611~666 页) 综合文稿 (忆文 16 篇); 郑万钧生平 (667~675 页); 郑万钧年表 (677~681 页); 编后记 (683~684 页)。

《郑万钧专集》是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纪念建院五十周年与南京林业大学组织编写的一部专著, 由中国林业科学院院长张守攻任主编、南京林业大学校长余世袁任副主编、中国林业科学院副院长金任副主编并兼编辑部主任的大型宏伟工程。其中《郑万钧林业学术思想研究》课题组成员 14 人 (原林业部副部长刘于鹤、中国林业科学院院长张守攻、副院长金旻、研究员黄鹤羽、唐午庆、江泽平、高级编辑凌云、高级工程师朱容、林泽攀、史爱民、林群、王秋丽、副研究员樊宝敏、副编审高全发), 主要著作评析部分 7 人 (其中 5 人为上述课题组成员, 另有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傅立国和南京林业大学教授向其柏), 忆文部分 15 人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植物所研究员王文采,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北京林业大学校长沈国舫,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蒋有绪, 南京林业大学教授熊文愈, 原中国林业科学院院长黄枢, 中国林业科学院研究员洪涛、李文田、唐午庆, 江苏省参事室主任、原南京林业大学校长赵奇僧, 南京林业大学教授朱政德、向其柏、黄宝龙、黄鹏成、缪印华、江西农业大学教授施兴华)。另外, 还有郑老的女儿郑鸿仪和儿子郑斯琨回忆父亲的文章。

郑万钧 (1904~1983), 字伯衡, 江苏徐州人, 1923 年毕业于江苏省立第一农校林科并留校任教, 1924 年任教于东南大学, 1929~1938 年任职于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 1939 年留学法国并获博士学位; 1939~1944 年任云南大学农学院林学系教授, 期间 1940~1944 年兼任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副主任, 1944~1950 年任中央大学森林系教授、系主任, 1950~1952 年任南京大学农学院森林系教授、系主任、副院长, 1952~1962 年任南京林学院教授、副院长、院长, 1955 年遴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现称院士), 1962 年后任中国林业科学院副院长、院长、名誉院长。郑老先后主编的教科书与学术著作包括《中国树木学》(第一分册, 1961), 《树木学》(上、下册, 1962)、《中国植物志》第 7 卷 (裸子植物, 1978), 《中国主要树种造林技术》(1981), 《中国树木志》(1~4 卷, 1983~2004)。郑老一生共发表学术论著 60 多篇 (部), 是中国著名的林学家、树木学家、林业教育家, 裸子植物分类学家。特别是 1948 年和胡先 联名发表‘活化石’水杉, 更是震惊国际学术界而名扬天下。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是中国林业研究的权威机构, 她能在郑老逝世 25 年后的今天, 由主要领导亲自挂帅、组织出版这样的宏伟著作, 不仅是对郑老一生丰功伟绩的最好肯定, 更体现出今日中国林业研究事业蓬勃发展、后继有人的欣欣向荣景象。作为林业教育出身的我, 虽然是一个晚辈, 而且知道郑老的名字只是 1979 年夏于母校东北林学院林学系林业专业学习树木学时的事情, 不过 1985 年获母校的树木学硕士学位 (导师杨銜晋、黄普华)、1987 年获北京医科大学药学院植物分类学博士学位 (导师诚静容), 毕业后又从事植物分类学的教学与科研并研究水杉的发现与历史, 使得我对郑老的

笔者根据《中国植物学文献目录》1~4 册 (1983~1995, 科学出版社) 统计, 仅包括公开发表的学术论著, 不包括各种会议报告及未公开发表的手稿等。

马金双, 水杉未解之谜的初探, 《云南植物研究》25 (2): 155~172, 2003; 水杉的未尽事宜, 《云南植物研究》28 (5): 493~504, 2006。

学问与知识更是敬佩有加。特别是郑老编写的教材、林学专著，分类学专著，不仅在当年学习的时候受益，就是参加工作 20 多年后的今天读来仍然倍感亲切。游学海外多年的我，2008 年秋得知《郑万钧专集》出版的消息后十分高兴，于是通过北京的朋友很快得到该书，并在收到后不到一个月就读完一遍。看完这本书，可谓浮想联翩、夜不能寐。特别是从下篇老一辈的回忆文章（多为郑老的学生或研究生撰写）中，从另一个侧面了解到郑老的为人与治学之道、更加钦佩郑老对事业的追求与执着。我虽然没有机会和郑老谋面，但他在动荡的年代里不畏艰险入川康考察、在祖国起飞时期克服难于大江南北调研、在科学的春天里争分夺秒的拼搏精神，还有那为林业事业与分类学事业培养人才并著书立著的伟大情怀，都将鼓励我终生。遗憾地是这样的一部名著，读后让人感到有些失望。在此提笔仅就编辑、校对、最后的整理与加工方面做如下评论，并希望通过这样的报道使该书得到其本来应有的学术与使用价值。

首先，全书总体规划欠妥，收录内容不详细。该书英文标题中郑老的英文名字只用汉语拼音 Zheng Wanjun，但郑老发表的所有文章英文名字都是韦式音标 Cheng Wanchun。仅仅使用汉语拼音会使该书很难让读者检索到，尤其是标题，不知道的读者还以为两个名字是不同的人，对于不懂汉语拼音的外国学者更是如此。该书 12 个图版中的 34 幅照片有近一半没有时间，很多也没有地点；照片中的人物只突出领导而他人很少列出，包括至今依然健在的郑老夫人也没有名字，似乎不尽人意。还有错误的地方，如‘在巨杉前留影’实为 1948 年夏在水杉树前；‘20 世纪 50 年代初国际植物学大会在日本召开，郑万钧应邀在大会上作专题讲演’的写法更是离谱。国际植物学大会截至目前共举行过 17 次，日本唯一举办的时间是 1993 年，而此时郑老已经作古 10 年。另外中篇收录的郑老所有中文文章的期刊都没有页码，而全部英文文章的期刊名称又翻译成中文，并且还有错误。如 592 页《国立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丛刊》译为《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丛刊》。该书中篇的论文精选中部分文章缺少来源，如 297~298 页的‘水杉属植物的分布与变迁’；678 页 1936 年发表‘中国木本植物新种’仅有页码但没有期刊名称；680 页‘年表’中 1964 年发表‘水杉属植物的分布变迁’和 681 页 1979 年‘水杉发现发表经过’也没有文献出处。该书最后的‘年表’所列郑老的论著，其中一些中文标题与原文不符，而且也不全面，缺少完整的出版物或论著目录。这对郑老这样的中国林学与植物学巨匠之专集，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第二，编辑工作粗糙，前后内容不一，让读者无所适从。第 90 页第 7~8 行记载‘1941 年当他第一次见到俗称“水杉”’，这里的时间‘1941’不仅是错误同时也与全书多处记载的郑老首次见到水杉标本的时间是‘1945 年’不一致。该书中至少 20 次以上记载郑老一生发表或发现 4 个植物新属，但 661 页竟记载郑老一生‘建立了 3 个分类新属’。第 668 页‘生平’中记载郑老‘1939 年初远涉重洋赴法国’，而第 678 页‘年表’中则记载郑老‘1938 年 12 月至 1939 年 11 月赴法国’。该书序言 II 页记载郑老发表论文 50 多篇，而第 683 页编后记则称‘撰写了 100 多篇论文及 4 部学术巨著’。这么多前后矛盾的写法，如果是不同作者的笔误可以理解，但如此明显的错误编辑也应该发现。第三，该书中的一些记载或说法不正确，更缺乏依据。如出版前言第 VIII 页第 3 自然段第 2 行称郑老当时在‘静生生物调查所’工作。实际上郑老当时应该在位于南京的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工作。郑老一生从来就没有正式在位于北平的静生生物调查所工作过，最多是 40 年代在静生生物调查所与云南省教育厅合办的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兼职。第 31 页第 2 行记载钱耐来中国的时间‘1946 年’是错误的，实际是‘1948 年’。第 92 页称《中国植物志》第 7 卷是‘最早出版的 3 卷册之一’的说法，实际是对《中国植物志》及其编写历史根本不了解。《中国植物志》1959 年开始编写，文革前就出版了 3 卷，分别是第 2 卷（蕨类，1959 年 11 月），第 11 卷（莎草科（一），1961 年 11 月）和第 68 卷（玄参科（二），1963 年 8 月），而文革后还有 1974 年出版的第 36 卷，1977 年出版的

胡宗刚，《静生生物调查所史稿》，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

马金双，水杉发现大事记，植物 3: 37 - 40, 2003。

第 63, 65 (2), 66 卷, 1978 年 3 月出版的第 54 卷, 1978 年 6 月出版的第 15 卷, 1978 年 11 月出版的第 67 (1) 卷; 而郑老执笔的第 7 卷则是 1978 年 12 月出版的, 最多只是文革后较早完成并出版的卷册之一。第 79 页记载秉志 ‘1928 ~ 1942 年任静生生物调查所所长’, 实际应该是 1928 ~ 1932 年; 第 80 页记载 ‘胡先骕是中国植物学会第一任会长’, 实际上中国植物学会第一任会长是钱崇澍, 胡先骕是第二任会长。第 80 页称 ‘方文培 1921 年考入东南大学生物系, 结业后在中国科学院植物所工作’。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1949 年以后才成立, 方文培在 20 年代如何在中国科学院植物所工作? 第 93 页 ‘日本也于 1950 年派植物学家到谋道溪专门采种’ 也没有依据。日本人 1949 和 1950 年从美国间接得到水杉种子, 而且至少在中国改革开放前没有日本学者到过中国的水杉原产地。另外, 680 页 ‘年表’ 中称 ‘1959 年创建中国裸子植物系统’ 的说法也不妥。郑老 1959 年才承担《中国植物志》的裸子植物部分的编写工作, 而有关中国裸子植物系统的文章最早是 1975 年《植物分类学报》(13 (4): 90, 图 1 ~ 66, 图版 13 ~ 17) 发表的, 以及 1978 年《中国植物志》第 7 卷裸子植物的出版; 1959 年如何创建系统? 更让我十分惊讶的是该书第 299 页 “中国裸子植物” 一文的脚注中记载 ‘诚静容: 原北京医科大学教授 (已故)’。诚先生是我的博士论文导师, 虽然毕业 20 多年间我们联系不是很多, 但我知道她今天依然健在, 而且就在北京。当我 2008 年底读到这里时, 发现我的导师 ‘已故’, 我怎么不知道? 于是马上给在香港浸会大学工作的师弟陈虎彪博士发信, 因为他经常往返京港两地。他说自己刚从北京回来, 诚先生身体很好。新春临近, 我又拿起电话 (2009 年 1 月 18 日星期日晚上), 先生的声音还是那样明快; 虽然 90 多岁高龄, 不仅交谈自如, 而且思路非常清楚, 生活仍然能够自理。而且她还告诉我, 目前的状况很好还能维持一段时间。我不知道本书的编者这样写有什么根据。第四, 郑老生前最后的工作就是念念不忘主编的 4 卷本《中国树木志》(1983 ~ 2004)。遗憾地是郑老故去后由于种种原因, 最后两卷迟迟不能出版 (其中第 2 和第 3 卷间隔达 12 年之久, 第 3 和第 4 卷也间隔 7 年时间), 待 4 卷本全部完成时已是郑老逝世 20 多年后事情。对这样的问题, 该书中没有交代, 就更不用提拖延多年后稿件内容的更新与修订了⁰。最后, 该书中对郑老各方面的情况介绍得非常详细, 唯独没有郑老在文革中遭遇的记载, 包括郑老失去亲生儿子、植物分类学家郑斯绪 (Cheng Sze-Hsue, 1931 ~ 1967)¹。在中国从事植物分类学的学者, 特别是 50 年代过来的老一辈, 都知道郑斯绪是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研究人员, 50 年代留苏的、60 年代曾经担任过植物分类室的负责人, 并对桦木科和豆科等类群有过专门研究²。著名豆科珍稀植物沙冬青属 (*Ammopiptanthus* Cheng f.) 就是郑斯绪于 1959 年发表的³。中国植物分类学界在老一辈的指引下而子承父业的仅有几例, 郑老父子便是其一 (另有著名植物学家钟观光与钟补求、南京大学耿以礼与耿伯介、四川大学方文培与方明渊、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李锡文与李捷,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物土壤沙漠研究所的崔乃然与崔大方等)。郑老对中国植物分类学的这份独特贡献, 历史不应该忘记。

马金双 2009 年 2 月 8 日晚于波士顿家中 (E-mail: jinshuangma@gmail.com)

胡宗刚, 《不该遗忘的胡先》,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5。

陈德懋, 《中国植物分类学史》,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3。

马金双, 世界栽培水杉的调查, 武汉植物学研究 26 (2): 186 - 196, 2008。

诚先生的出生时间有两种记载: 1918 年 (傅立国, 《中国植物标本馆索引》,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3) 和 1919 年 (Holmgren et al. Index Herbariorum, ed. 8, New York Botanical Garden, 1990), 但诚先生本人在电话中说以前的记载有误, 实为 1913 年生; 1938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生物系。

郑万钧, 《中国树木志》, 中国林业出版社, 第 1 卷, 1983, 第 2 卷, 1985, 第 3 卷, 1997, 第 4 卷, 2004。

⁰ Jinshuang Ma, Book Review: "Sylva Sinica" by Wan-chun Cheng, p. 1-5429, Vols. 1-4, 1983-2004. Taxon 54 (1): 262 - 263, 2005。

¹ 傅立国, 《中国植物标本馆索引》,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3。

² 匡可任, 李沛琼, 《中国植物志》第 21 卷, 科学出版社, 1979。

³ 崔鸿宾, 《中国植物志》42 (2) 卷, 科学出版社, 1998。